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 / 朱立元主编

Fiction
and
Repetition

小说与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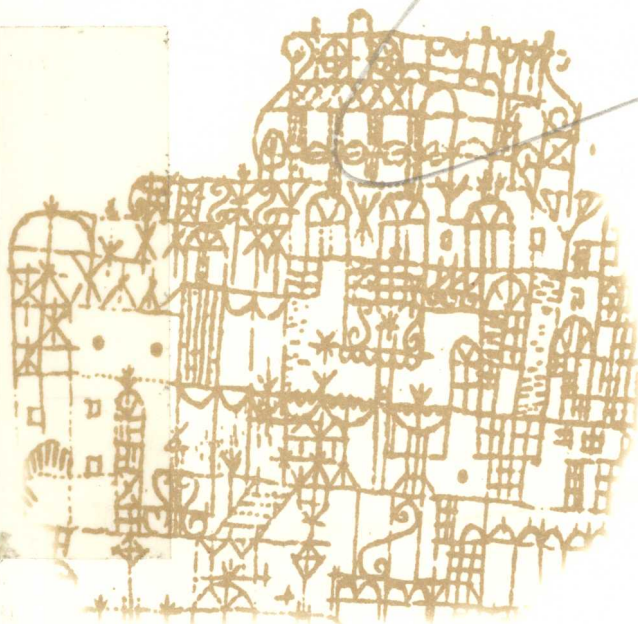
——七部英国小说

J. Hillis Miller

[美] J. 希利斯·米勒 著

王宏图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I561.074/18

2008

小说与重复

——七部英国小说

[美] J.希利斯·米勒 著

王宏图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 / (美) 米勒著; 王宏图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01-05006-5

I. 小... II. ①米…②王…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
英国—近代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990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5-79

Fiction and Repet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y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 价: 28.00 元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

朱立元 主编

荒野中的批评

——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

[美] 杰弗里·哈特曼 著

阅读的寓言

——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

[美] 保尔·德·曼 著

小说与重复

——七部英国小说

[美] J. 希利斯·米勒 著

误读图示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著

选题策划 岳 勇

责任编辑 岳 勇

装帧设计 王伟毅

总 序

001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在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直接影响下,在美国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为代表的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人们戏称为“耶鲁‘四人帮’”。这四位学者出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把解构主义思想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刮起了一阵解构主义旋风,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这套“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精选了四位学者的代表作:德·曼的《阅读的寓言》(沈勇译)、米勒的《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布鲁姆的《误读图示》(朱立元等译)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现翻译、推介给读者。

《阅读的寓言》是耶鲁学派的领头人物德·曼的一部代表作。它提出了其独特的修辞学阅读理论,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从而深化、发展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误读图示》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吸收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德·曼的解构思路,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和创造意义,所以“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他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文学史(主要是浪漫主义诗歌史)的影响研究上,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独创性结论。

《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作者J.希利斯·米勒至今仍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本书对英国文学史上的七部重要小说作了详尽的解构主义分析和阐释，它抓住各部作品中重复现象不同的运作方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并着力探索“意义怎样从读者与页面上这些词语的交接中衍生而出”，为人们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意义空间。

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也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结合作品分析强调指出，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因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多义的、变化的，文学文本的语言更是在不断破坏、消解自身的意义，因此是一种“持久的变项”；这也消解了文学与批评的界限，所以它反复强调批评也就是文学。它还认为，批评需要读者，读者既是作品的解释者，又是作品的创造者。

以上四部著作既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的代表作，又有力地推动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德里达的去世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的消亡。现在作为理论思潮的解构主义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它的理论思路、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等已经深深地扎根并融入当代各种学术、文化思潮之中，正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耶鲁‘四人帮’”作为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接受和传播者，特别在文学批评领域成功地应用、阐释、发展了解构主义理论，并加以推广和传播，在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部分著作已经译介到我国，可惜以上四部著作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译本，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酝酿翻译这四部著作，并于1991年就已经完成了翻译。后又几易其稿，多次修改、整理，近期终于付梓。当然，由于是译本，就有一个联系版权的问题。这方面，除了岳勇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外，我的好友、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美国宾州克雷瑞思大学英语系主任徐乔奇教授自始至终给予了直接、全力的帮助。徐乔奇教授花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与哈佛、耶鲁、牛津三家出版社联系版权交易事宜,中间又有几度波折,他都设法解决。仅为此事,他就给我发了数十封电子邮件,打了好几次国际长途。这套书能够及时解决版权问题,乔奇教授功不可没。在此,我代表几位译者,首先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岳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帮助我们圆了出版这套丛书的梦;同时,也向夏康达教授、徐乔奇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帮助我们联系了国内外的有关出版社。此外,我的师弟、南开大学陆扬教授慨然允诺帮助我们校订一遍,改正其中的不当之处,这真使我们非常感激。

这套译丛虽然出版得晚了一些,但是相信其中许多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希望它们对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仍会有所启示。

朱立元

003

前言

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是耶鲁批评派的一员主将。米勒的文学理论生涯始于1954年,当时他在欧柏林学院就读,刚由物理学专业转到英美文学专业时,就开始接触新批评。后转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布希(Douglas Bush),1952年以博士论文《狄更斯的象征意象》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威廉姆斯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等校任教。1959年被评为副教授,1963年升为教授。1972年到耶鲁大学,同德·曼、布鲁姆、哈特曼等一起形成耶鲁学派。1976-1979年任该校英文系主任。1986年起,他转赴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在英文和比较文学系任教至今。1986年当选为全英语文学会主席。他著述勤奋,主要著作有:《狄更斯的小说世界》(1958)、《神的隐设:五位十九世纪作家》(1963)、《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1965)、《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长篇小说》(1982)、《语言的时刻:从华兹华斯到史蒂文斯》(1985)、《阅读伦理学》(1987)、《毕英莱恩诸貌》(1990)等。

001

米勒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年以前,“新批评”时期;第二阶段是1952-1968年,现象学或意识批评时期;第三阶段从1968年起转为解构主义批评至今。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批评在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界是占优势的流派。米勒在求学期间,经受了新批评的严格训练,特别是从语言学角

度对文本进行“细读”和分析的训练,使他一生受益匪浅。他后来虽然在美学和批评理论方面经历过两次大的转折,但善于对文学作品文本细读深解的习惯和本领却始终未变。即使在解构主义时期,这一初衷仍未改变。他在80年代曾说,自己研究文学、读解文本语言文字的“主要动机在我刚开始研究文学时就已成形:设计一个方式,有效地觉察文学语言的奇异之处,并试图加以阐释说明”^①。不过,即使在这一阶段,米勒对新批评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已有所不满,酝酿着某种突破。

1953年米勒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结识了当时法国的著名现象学批评家布莱(Georges Poulet)。他以倡导“意识批评”著称。米勒较多接受了他的影响。布莱的“意识批评”与新批评根本不同,不是执着于单个文本的语言,而是回到作者,认为作家的意识有其整体性,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是其整体意识的不同面貌和方式的展示或显现;因此,文学批评的目的不在于阐释、评判个别文本,而是要完整地“界定作者的心灵”;批评家应当透过一位作家看似纷繁复杂乃至自相矛盾的众多作品,“找出创作者内心原初的整体”。不过,米勒在接受布莱影响时,并未忽视对文本语言的细读,而只由此入手,来窥视一位作家的心灵整体。

米勒“敬献给布莱”的《狄更斯的小说世界》一书,就遵循了“意识批评”的原则。他认为狄更斯的“所有作品构成一个整体,有上千路径从此整体中辐射而出,从其作品的每一事件与意象中,可以看见作家连续创作的核心是一种无法摸到的组织形式,正是这种组织形式不断地支配其遣词造句”。具体来说,他通过分析狄更斯全部小说文本之后,认为作者的关心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问题:寻找能赖以生存的地位身份”,这在其早期小说中,集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截然不同,被深锁在个人怪癖的扭曲现象中”这一总主题,如《马丁·朱述尔维特》表现

① 第一章“重复的两种形式”,《小说与重复》,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

除了依附于社会“取得伪装身份外,别无他途,虽然这种伪装身份是欺骗行为和寻求自我的作假”;《大卫·科波菲尔》与《董贝父子》则展现出“从依赖于亲子关系转为依仗成人的浪漫爱情来逃避孤独”这样一个意向;《荒凉山庄》、《小多丽》、《孤星血泪》等,透露出狄更斯对社会邪恶的控诉及对单凭自身力量(特别是爱情)难以自救的思考;而到《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更流露出对心灵美、善的超越性的绝望哀痛^①。米勒就这样在解剖狄更斯众多早期小说的基础上,发现了他那苦苦探求人们生存之路的心灵的整体。

在稍后的《神的隐没》中,米勒用意识批评方法对五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罗伯特·勃朗宁、艾米丽·勃勒蒂、马修·阿诺德和曼雷·霍普金斯的作品进行整体性分析。他从海德格尔提出的神人同在、可经验到神力的“原始世界场景”出发,认为在近代作家那里,神已隐没、消失,只有孤独的自我和相对的历史主义世界。而上述五位作家面对无神的世界,采取浪漫主义态度。他说,这些“浪漫主义者仍然信神,他们无法忍受神的退隐。他们不惜代价仍然企图重建与神的交往沟通”;“浪漫主义把艺术家定义为创造或发现迄今尚未被人理解的象征的人,正是这些象征跨越鸿沟,建立了人与神的新关系”^②。按照这一总的精神,米勒具体分析了每位作家如何在自己作品中开辟与神沟通的道路,以部分回复对原始世界场景的体验。

到60年代中期的《现实的诗人》,米勒把《神的隐没》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应用到现代诗人如叶芝、史蒂文斯等人身上,认为他们的“起点与基础从神的隐没转为神的死亡”,他们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忽视了谋杀神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结果,当神及天地的创造成为意识的对象,人便成了虚无主义者,人只有放弃自我,并像史蒂文斯所说的那样“赤脚

① 参见《狄更斯的小说世界》1958年英文版。

② 参见《神的隐没》1965年英文版。

走进现实”——在这“现实”中，“物体以原本的面貌、以其存在的整体展现自己”，“在这新的空间里，心灵散布于万物中并与之结为一体”，而不再是心物二元对立——这“就是20世纪诗的范畴”，是每位伟大诗人逃离虚无、获得诗情的根源：“每位诗人各以其道进入这个新现实：叶芝肯定了有限时刻的无限丰饶；艾略特发现使道赋形显现就在此时此地；托马斯接受死亡，使诗人成为拯救万事万物的方舟；史蒂文斯在存在之诗中确认了想象力与真实。”^①这仍是从一个时代的总体意识来概括每位现代诗人的总体意识。米勒这些论述把意识批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德里达思想的影响下，从60年代后半期起，米勒开始了向解构主义思想的转折。《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和《哈代：距离与欲望》二书就是这个转折期的成果。他后来回忆道，《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是一本转型期的书，它写于1968年，之后便是讨论哈代的书。那些书是对话式的，因为它们与我后来采用的批评与著述观点只有一线之隔。这些书有两个参照中心：意识与语言”^②。显然，这时的米勒一只脚已迈出意识批评之门而踏上解构批评之路。如果说，他的批评生涯从语言（新批评）起步，尔后离开语言而走进意识（意识批评），那么，当他接受解构主义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语言，用米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运用语言谈语言”。

在《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中，一方面，意识批评的思想仍然承续了下来，他仍以神之死亡作为核心意识的假设，认为“维多利亚小说的基本主题可说是探索在无神的世界里，寻求把他人尊为神的种种途径”^③；另一方面，小说语言形式和修辞学问题受到了关注，诸如小说中的时间使用、叙述者的地位、语态及其与作者的关系等，米勒都作了认

① 参见《现实的诗人》1965年英文版。

② 转引自台湾省《中外文学》杂志第20卷第4期，第17页。

③ 参见《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年英文版。

真研究,这些都为日后的解构批评铺平了道路。《哈代:距离与欲望》一书也大致相似。该书首先对哈代的所有小说作了意识上的总括,认为“哈代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以意识的超然无涉为基础,这使他及其代言人能窥见未经扭曲的现实的原貌”;他把爱欲作为“从唯一可能的地方找到秩序的源泉”,用爱欲来“建立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尺度”;然而,爱欲却需要情侣间的距离,所以哈代的所有小说都在爱欲中设置了距离。接着,米勒又从意识批评转向小说语言文体形式的探讨,他说:“哈代每部小说的时间构架都是上述形式的变化。随着情侣们相互贴近或分离,小说也像活动的力场般变化着。每个角色都是力的交叉点,小说的进展也由一群情侣间的接近或疏远来决定。越是有距离,欲望就越强烈。”^①这一时期的米勒,正处在从意识批评向解构批评转轨的途中,因而具有兼重意识与语言的两重性特征。

70年代,米勒完成了向解构主义的转折。他步尼采、德里达之后尘,公开提出批评“阐释预设所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应该彻底摒除,因为德里达、尼采等人已揭示出文本绝无单一的意义,而总是多重模糊不确定意义的交会”^②。他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础是,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实在,因此,文本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意义不确定的,这些意义“彼此矛盾,无法相容。它们无法构成一个逻辑的或辩证的结构,而是顽强地维持异质的混杂。它们无法在词源上追溯到同一词根,并以这单一根源来作统一综合或阐释分析。它们无法纳入一个统一的结构中”。米勒曾以弥尔顿《失乐园》中第四部《藤蔓缠绕她的鬃发》为例,进行解构性阐释,他说:“一方面,弥尔顿把夏娃纳入整个创世系统,说她像亚当一样尚未堕落,是否堕落并不一定。虽然在她

① 参见《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年英文版。

② 参见《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书评,载美国《批评扫描》杂志1972年冬季号。

身上像在亚当身上一样,‘他们光辉的造物主的形象闪耀’,但他们‘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性别看上去不同’:她生来就注定属于亚当,再通过亚当属于上帝;‘他只属于上帝,而她通过他属于上帝’。”^①这句诗里比喻干扰了神学,独立性冲击了从属性,解构批评就应这样从文本语言中找出各种互相干扰或对立的矛盾中来,从揭示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各种意义之间的互相矛盾和互相“破坏”中来。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对“寄主”与“食客”二词的解析是另一适例。他通过二词孪生的语源分析,一步步揭示二词意义的分化、隐喻,直至对立的过程,指出,一方面,“寄主”(文本)起码像“食客”(批评家)一样;另一方面,批评家并不比其所解释的文本更像“食客”,因为文本本身就像食客一样要依靠其主人的愿望那样去接受它。这里,他玩弄的是“比喻的游戏”。米勒在修辞性阅读、批评实践中,总括了许多解构的方法,如骤变句法、偏斜修辞法、既显又隐、异貌同质、僵局、挪移对比法、旁述、拟人法等等。解构的修辞学批评,使文本语言呈现的世界变得捉摸不定、乃至不真实,任何模仿论批评的根据也就丧失殆尽,于是,语言反倒成了真正的现实。与德·曼一样,米勒把语言的比喻(修辞)性看成语言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因此,批评只能是解构:“解构主义与其所属之长久传统的主要预设,可以说与比喻语言一脉相承,这不是在易分析的语法上添加的”,而是“一切语言都是比喻的,这是基本的、不可改变的”,因此“一切好的阅读都是要解读比喻,同时也要分析句法和语法形态”^②。

米勒把解构批评看成为将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就好像一个小孩将其父的手表拆成一堆无法照原样再装配起来的零件。这是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或其他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其根据是

① 转引自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② 转引自《中外文学》第20卷第4期,第20—21页。

文学或其他文本的“言词(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已不复存在,虽然种种“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中,但同时又被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坏。它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能被视为围绕‘逻各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比喻游戏暗示我们必须停止为内心的疑惑或畏惧而去寻找某个完全合理的意义,因为这种疑惧导致意义的摇摆不定。辩证的两极虽能综合,但也可能由同中之异瓦解为互相冲突的成分”^①。显然,这种解构主义思想蕴含着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传统思想模式,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巨大破坏力量。

米勒在解构主义阶段的代表作为《小说与重复》,这部书是他在70年代运用解构主义思想对英国几位著名作家的七部小说研究和评论的结集,书中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的目标是要“设计一整套方法,有效地观察文学语言的奇妙之处,并力图加以阐释说明”。他抓住的“奇妙之处”便是小说中的“重复”现象。他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读解,将其大体归为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上比(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他指出,人们阅读时常忽略这些重复现象,但许多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恰恰来自诸种重复现象的结合,因为“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换言之,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

① 见《当代理论向何处去》,载《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期刊》1979年1月号。

的活动方式,是通向作品内核的秘密通道,如果有这一内核的话。从总体来看,米勒并不承认文学作品有一个权威的、固定不变的意义内核。他对七部小说正是从其种种重复现象的描述入手,揭示作品复杂多样、变幻莫测,甚至互相矛盾的意义,从而将文本分解成碎片。

在该书第一章“导论”中,米勒还吸收了德鲁兹的有关观点,总结出重复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他称之为“柏拉图式的重复”,另一种是“尼采式的重复”。柏拉图式的重复是指以理念为万物原型的模仿式重复,这种重复强调真实性上与模仿对象的吻合一致,这是19至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批评的首要预设,成为有强大势力的“规范式理论”;而尼采式的重复则假设世界建立在差异基础上,认为“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似以此‘本质差异’为背景而出现。这个世界不是摹本,而是德鲁兹所说的‘幻影’或‘幻象’。它们是些虚假的重影,导源于所有处于同一水平的诸因素间的具有差异的相互联系。缺乏某些规范或原型的根基,意味着这第二种重复现象具有某种捉摸不定的神秘效果”。米勒还借用本雅明用“记忆”对普鲁斯特作品意象的分析来进一步说明这两种重复形式的区别。他认为,不同的重复形式存在于记忆结晶的不同形式中。一种“白昼里自觉的记忆”“通过貌似同一的相似之处合乎逻辑地周转运行着”,这与柏拉图式的重复相对应;另一种“不自觉的记忆”,本雅明称之为“珀涅罗珀式的遗忘的结晶”,虽“也是以众多的相似点组成的,但本雅明将它们称为‘不透明的相似’。他将这些相似点和梦联系起来,从中人们体验到一样事物重复另一样事物,前者与后者迥然不同,但又惊人地相似”,这与尼采式的重复相对应。米勒还对这两种重复形式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重复的第二种形式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它依赖于有坚固基础的、合乎逻辑的第一种形式。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非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它们

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这也正是解构批评的理论根据。米勒据此假设“所有的重复样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体现了”上述两种基本“重复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缠绕成一体”^①。下面以米勒对勃朗蒂《呼啸山庄》的分析为例简要介绍一下他的解构主义“重复”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应用。

米勒描述了批评家和读者在读解文学作品时的真实处境:他们相信会有一种完满的解释,能使人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作品;但在阅读过程中,当他们想构造一个首尾连贯的阐释模式来完整解释作品时,这种期望却不断受挫。对《呼啸山庄》,米勒通过其中许多重复现象的分析,指出以往无数批评、阐释的文献都走入了误区,“所有的文学批评展现的是所谓的对论述的文本所作的明确而有条理的解释,而《呼啸山庄》批评的特色正在于形形色色的阐释间的互不相关达到了这样一种罕见的程度,凭借这种方式,每个解释捕捉到了这部小说的某些因素,并由此推导出总体上的阐释”,他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每个解释都有其“片面性”。其共同的谬误在于预先假设了“意义是单一的、统一的,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米勒指出,“认为《呼啸山庄》中存在着唯一的神秘真理,这一假设本身便是个谬误”。解构批评则相反,它“最能清晰地说明文本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为文本中明显地存在着多种潜在的意义,它们相互有序地联系在一起,受文本的制约,但在逻辑上又各不相容”。米勒具体论述道,“《呼啸山庄》对读者的影响是通过构成作品的重复现象——它和其他作品里理性永远无法将它分解为某种令人满意的阐释本源的重复现象相同——来实现”,就是说,小说中许多重复属于尼采式的重复现象,而不只是模仿原型的柏拉图式的重复,这种非逻辑、非理性的重复,是整体化、理论化的传统读解

^① 参见《小说与重复》第一章“重复的两种形式”。

方式所无法完全把握的,“这一解释过程总将遗留下一些东西,它们正巧位于理论视野圈的边缘,不在该视野的包纳范围之内。这被忽视的因素显然是重要的细节……由此我们发现文本实在过于丰富”。米勒就抓住这些被遗忘或忽视的重复细节,展开解构批评,证明该小说文本的丰富多义及多种意义都能成立又互不相容,因而压根儿不存在唯一的、统一的、神秘的意义中心和本原。语言、符号仅仅存在于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分化对立中,就连认为存在原初统一整体的观念本身也是从此分化中衍生出来的,同时这种错觉又为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所强化。正因为如此,《呼啸山庄》成为充满重复和神秘莫测的文本。据此,米勒总结道:“在期望这部小说成为重复具有根基(按:即本原)的第一种形式的典范的诱惑和这种期望不断受挫的来回摇动中,《呼啸山庄》成了第一章中叙述的两种重复形式缠结交叉的一个特殊实例。”^①

更晚近的《语言的时刻》,是米勒读解华兹华斯、雪莱、勃朗宁、霍普金斯、哈代、叶芝、威廉姆斯、史蒂文斯等诗人的诗作的论集,其主旨仍在揭示其中语言背后意义的暧昧不明、模糊不定或自相矛盾,证明语言是无根无源或阐释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一切诗在逻辑上都是无法理解的。他说道,“诗歌文本中止的时刻,不常在开头或末尾这些对其自身媒介作反映或评论的时刻。……而是一种旁述的形式,粉碎了把语言视为能透明地传达意义的幻觉”;如在霍普金斯等诗人那里,“语言也是分隔的媒介,而非调解结合的媒介。同时,所有的事物汇集于语言中却只有步入消散之途”^②。

近年来,有人批评米勒的解构主义陷入了语言的泥淖,而与历史、社会、伦理相疏离。米勒驳斥了这种指责,以《阅读伦理学》(1987)一书阐释了自己的主张。

① 参阅《小说与重复》第三章“《呼啸山庄》——重复和‘神秘莫测’”。

② 参阅《语言的时刻》1985年英文版。